

上海三联学术文库
SHANGHAI SANLIAN XUESHU WENKU

【法】米歇尔·福柯 著
莫伟民 译

Michel Foucault

词与物

——人文科学考古学

Les mots et les choses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法] 福柯著; 莫伟民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上海三联学术文库)

ISBN 7-5426-1631-5

I. 词… II. ①福…②莫… III. 哲学理论—法国
—现代 VI. 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0454 号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著 者/[法]米歇尔·福柯

译 者/莫伟民

责任编辑/倪为国

装帧设计/范岍青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上海市印刷十厂

版 次/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17.125

印 数/1-4100

ISBN 7-5426-1631-5

B·128 定 价 26.00 元



《宫中侍女》是17世纪著名画家委拉斯开兹的作品

译者引语：人文科学的考古学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是并且仍将是最为光彩夺目的思想大师之一。福柯的著作已被译成 60 多种文字,就足以说明他所具有的世界性的影响。他的思想是“最伟大的现代哲学之一”,他的扛鼎之作《词与物》是“一部关于新思想的伟大作品”(德勒兹语)。《词与物》无疑是西方文化考古学家福柯最重要的代表作。这不仅是因为《词与物》对自文艺复兴以来直至 20 世纪初的整个西方文化和知识史都作了细致入微的、富有创见和深度的梳理和剖析,而且更因为它从根本上驱除了笼罩在当代知识形式的决定性条件之上的人类学主体主义的迷雾,批判了自笛卡尔、尤其自康德以来 200 多年西方哲学传统的先验意识哲学和主体主义。

《词与物》所涉及的论域:既不是由文化的基本代码为每个人确定的经验秩序,也不是对这个经验秩序进行思考和科学理论或哲学阐释,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更加真空、原始和

2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基本的秩序经验。福柯要弄清楚在 16 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发展中,人们为了建构在语法和语文学、自然史和生物学、财富分析和政治经济学中所使用的那样实证的知识基础,人们曾在时空中认可和设定了哪种秩序形态。《词与物》旨在重新发现人类认识和理论的可能基础,知识得以在其中确立的秩序空间,并为观念的显现、科学的确立、经验的哲学反思和合理性的塑成和消失提供历史先天性基础。但《词与物》所要做的工作并不类似于观念史或科学史,而是要阐明那个已撇开了任何理性价值或客观进步的认识论领域,即认识型(l'épistémè),并认为应该把知识空间内那些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经验认识的构型揭示出来。于是,“所涉及到的,与其说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历史,还不如说是一种‘考古学’”(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Éditions Gallimard, 1966, p13)。但福柯曾特地指出,他所讲的“考古学”并不确切地指一门学科,而是指重构和考查作为认识、理论、制度和实践之深层的可能性条件的知识。如正是有关癫狂与非癫狂相对立、有序与无序相对立的某种知识才使大禁闭中心在 17 世纪末的欧洲有可能开设。考古学就是要寻找这样的知识。

但福柯从未想撰写人文科学的一般历史,也不想对科学的可能性作一般的批判。“《词与物》的副标题不是人文科学唯一的考古学(l'archéologie),而是人文科学的一种考古学(une archéologie)”(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Questions à Michel Foucault sur la géographie”, 1976, p29)。这不仅敞开了学者特有的谦逊的胸怀,即他“不是那类对或想对无论什么样的科学都拥有真理话语的哲学家”,而且还亮明

了福柯一贯的拒斥立场，即他完全否认有什么科学的科学能在整个科学中发号施令，起着普遍裁决、判决和见证这样的作用。

福柯在《词与物》中所探讨的这—种考古学，已经揭示了在 17 世纪中叶和 19 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的认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西方理性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第一次断裂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终结和古典时代的开启，标志着能构建知识的相似性原则被同一与差异原则所取代，标志着阐释被分析所取代，标志着词与物从同一走向分裂，书写不再是世界的散文了。第二个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时代的开端，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l'homme)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且适合于人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也打开了。

因福柯并不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热衷于那些与哲学相近的、能在发展过程中连续不断地涌现出真理和纯理性的崇高的、严密的和具必然性的科学(如数学、宇宙学和物理学)，所以，《词与物》对“知识的匿名的间断性”的考察，完全是聚焦于那些因涉及到生物、语言或经济事实而被人认为是具有偶然性的经验对象的科学。从普通语法到语言学，从财富分析到政治经济学，从自然史(或博物学)到生物学，无不都是经验科学。《词与物》的初始假说就是，经验知识在特定的时空也可以是有明确的规则的，谬误与真理都可以遵循某个知识译码的种种法则，非形式化的知识的历史本身也拥有一个体系。当然，《词与物》并不是想在特殊类型的知识或观念体系的基

4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础上重构大时段的时代精神和世界观,而只是一种严格的“区域性的”研究,描述特定时期特有的认识论空间(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 “Préface à l’ édition anglaise”, 1970, p7—8)。

对博尔赫斯所引述的某部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法的读解,是促使福柯撰写《词与物》的主要动因,从而使福柯认识到确立物之序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福柯曾说过,他“在《词与物》中想从事的是秩序的历史,说的是一个社会借以思考事物间的相似性的方式和事物间的差异借以能被把握、在网络中被组织并依据合理图式而被描绘的方式”(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69, *Les Mots et les Choses*, 1966, p498)。因而,《词与物》考察有关词(语言)与物(实在)的秩序的不同观念体系,分析纯粹的秩序经验和秩序存在方式的经验,撰写“认识型”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基本上是间断的历史。

《词与物》中使用的“认识型”,指的是在某个时期存在于不同科学领域之间的所有关系。科学之间或各种部门科学中的不同话语之间的这些关系现象,就构成了福柯所说的一个时期的认识型。因此,福柯的认识型与康德的范畴毫不相干(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 “Les problèmes de la culture, un débat Foucault - Preti”, 1972, p371)。作为不同科学之间的关系集合,认识型就是西方文化特定时期的思想框架,是“词”与“物”借以被组织起来并能决定“词”如何存在和“物”为何物的知识空间,是一种先天必然的无意识的思想范型。

在于奇智先生看来,历史先天性和档案是认识型的具体

化,而认识型又是话语的具体化(于奇智:《哲学研究》,1998年第3期)。这种看法是值得讨论的。从总体上说,于先生在强调福柯主要术语前后变化的连贯性时,却忽视了其差异性。且不说福柯喜好不停地进行别种思考和面目全非的写作,福柯也不愿看到《词与物》因使用了“认识型”、“语言”这样的词而被人看作是结构主义的作品,不愿看到因自己的人文科学考古学使用了“认识型”而被别人看作是依据文化总体性作出的。因而,在三年后的《知识考古学》的“前言”中,福柯承认包括《词与物》在内的先前的著作并没有很完善地挣脱最后的人类学束缚,《知识考古学》并不是对《词与物》的复述或确切的描写,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词与物》的,它“还包括不少的纠正和内部批评”。纠正工作的重要方面就是转换术语,如用“话语”来替代“语言”,用“话语实践”来取代符号的指称作用,用“话语”的重要性来取代“认识型”的重要性。“话语”是不能还原为语言或言语的,“历史的先天知识”要说明的是,“话语并不只具有意义或真理,而且还具有历史,有一种并不把它归于奇异的生成变化律这样的特殊的历史”(Michel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Éditions Gallimard, 1969, p168)。“我们可把一组属于同一个话语构成的陈述集合称作话语……我们可以确定这些有限陈述的一组存在条件……话语通体都是历史的……”(同上, p153)。这样的陈述体系就构成了“档案”,“档案对处于各种各样存在之中的话语作区分,并详细说明话语特有的延续”(同上, p171)。很显然,“话语”直接就是由构成为“档案”的陈述构成的,于先生怎么会认为“历史先天性和档案是认识型的具体化,而认识型又是话语的

具体化”呢?怎么会认为会具有特殊历史的“话语”要比“认识型”更抽象呢?怎么会以为作为无意识的知识总体的“认识型”是“通体皆历史的”话语的具体化呢?怎么会认为“档案”和“认识型”都是“话语”的产物呢?

必须说明,虽然《词与物》也使用“话语”,但此“话语”非彼“话语”,它指的是起着表象作用的“古典语言”,在西方知识史上是与水火不相容的和交替出现的。难道于先生把这搞混了?福柯恰恰要批判西方哲学史传统的“基础主体的论题”、“对立的论题”、“初始经验的论题”和“普遍中介的论题”都忽视了话语的“实在性”：“话语实在性在哲学思想中被忽视这一非常古老的做法,在历史进程中已呈现出许多形式”(Michel Foucault, *L'ordre du savoir*, Éditions Gallimard, 1971, p48)。于是,福柯要质疑西方的真理意志,恢复话语具有的事件的特性,最终消除能指的统治权。另外,如果说历史先天性和档案是认识型的具体化,那该如何看待权力与认识型之间的关系?从福柯后来提出“权力—知识”这一合二为一的概念来看,于先生是否也要把权力看成是认识型的体现呢?我以为这可能是有欠妥当的,因为“自《戒律与惩罚》以来,认识型已被权力所取代。(Carlo Freccero, “Savoir et pouvoir à l'ère de la vidéo”, *Magazine littéraire*, N°325—octobre 1994, p32)”

再有,也不知道于先生是依据什么说“间断性”比“认识型”更重要?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当法国某本词典把福柯称作“一位把历史理论奠基于间断性的哲学家”时,福柯感到目瞪口呆。因为福柯并不想高呼“间断性万岁”,而只是想知道为何在某些时候,在像生物学、政治经济学、精神病学和医学等

的经验知识中，会发生与人们通常具有的平静的和连续的景象不同的突然中断、加速的发展和转型（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 “Entretien avec Michel Foucault”, 1977, p143）。间断性只是处于不同认识型之间的分水岭，而非西方知识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福柯在《词与物》中明确说过，间断性只是思考方式发生突然终止和改变这样的事实。

还是言归正传。《词与物》的主旨之一就是批判福柯所深恶痛极的 200 多年的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理论形态——即人类学主体主义。福柯始终怀疑和敌视那个至高无上的、起构造和奠基作用的、无所不在的主体。

在《词与物》出版的同一年，福柯曾回忆自己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已经非常远离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的主体哲学了，从对生活、政治存在的激情转到了对概念和“体系”的热情。《词与物》设法阐明的就是这样作为关系集合的体系。这些关系把事物联系在一起，但又独立于事物而维持着、转化着。这个体系还先于人及其一切活动而存在着，人们的任何行为都受制于一个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理论结构、体系。“这个无主体的匿名体系是什么呢？谁在思考呢？‘我’已经爆裂了（请看现代文学）——这是发现‘有’（il y a）。有一个集合名词，即有人、人们（on）。以某种方式，人们又回到了 17 世纪的观点，差别在于：不是把人置于上帝的位置，而是匿名的思想，无主体的知识，无身份的理论……”（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69, “Entretien avec Madeleine Chapsal”, 1966, p513—515）。

福柯之所以发动对主体哲学的批判，这不仅是因为 20 世纪 50 年代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导致福柯的政治理想破灭了，而且还有深刻的思想上的动因。因为福柯认为科学话语的历史分析最终应属于话语实践理论，而非属于认识的主体理论（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 “Préface à l’édition anglaise”, 1970, p13）。

福柯的批判首先聚焦于近代主体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在古典时代，以笛卡尔理性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大写理性的独白把癫狂压制到沉默无声的地步。作为社会底层的发掘者和辩护者，福柯非常关注癫狂曾被捕捉、被剥夺资格、被禁闭、被鄙视和诋毁的方式。福柯批判西方大写的理性，是为了改变因癫狂受抑制而造成的理性独白的局面，是为了替非理性争得应有的权利，为了恢复理性与非理性的对话。这并不是要否定任何理性的作用，而是希望人们从理性化与人类暴行的关系中感悟到什么。

如果说福柯的批判对象，在古典时代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的主体哲学，那么，在现时代，从康德和 18 世纪末起，就是人类学了。由于从 17 世纪中叶至 18 世纪，对语法或财富体系作研究时，只需通过能对物之序作表象的话语，而无需通过人文科学，所以，人在古典知识内部并不存在。只有从 19 世纪初起，当话语失去了它在古典知识中曾经拥有的组织作用和对经验世界的法则力量时，人才存在，人文科学才产生。也就是说，人的存在与话语的存在是不相容的，人之序与符号之序是不相容的，活着的、劳动着的和讲着话的人只存在于话语消失的地方。由于现代哲学把对人的有限性所作的经验分析

误当成了对人的无限本质所作的先验分析，所以，现代哲学就陷入了“人类学沉睡”之中。通过存在论寻根，通过对心理主义和历史主义进行批判，通过语文学批判，都可以把现代思想从人类学昏睡中唤醒过来。因为在19世纪，以人为经验对象的人文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是在“知识三面体”（一是数学和物理学这样的演绎科学，二是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这样的经验科学，三是哲学）的夹缝中生存的。由于现代思想不能使这三者各居其位、各得其所、各司其职，所以，就容易使这三者陷入人文科学、进而陷入“人类学主义”的危险之中。由于这三者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人文科学的疆域和对象也是易变的，人文科学势必被精神分析和人种学这样的反人文科学所取代。精神分析和人种学都不停地“拆解”那个在人文科学中创造和重新创造自己实证性的人，它们并不询问人本身，而是询问通常使得一种有关人的知识成为可能的区域。福柯借用列维—斯特劳斯就人种学所说的话来说精神分析和人种学，即它们消解了人（elles dissolvent l'homme）。人从不存在到存在再到消失，这都是西方认识型的知识的基本排列发生变化的结果。

按照福柯的说法，康德虽实施了哥白尼革命，但又认为“自在之物”不可知，所以，康德的批判哲学变成了人类学。福柯所说的人类学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门特殊学科，而是指使得哲学问题全都置于人类有限性（la finitude humaine）领域之内这样一个哲学结构。人类学的典型特征就是把知识的可能性与理性的界限、人的有限性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自康德以来，人们不再是从无限或真理出发来思考人的问题的。

“如果人们只能对作为一个自然人(*un homo natura*)或作为一个有限存在(*un être fini*)的人进行哲学思考,那么,整个哲学从根本上讲难道都不将是人类学吗?此时此刻,哲学就成了文化形式,在这种文化形式内部,所有人的科学都是可能的”(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 “Philosophie et psychologie”, 1965, p439)。康德的基于有限自然之上的先验是不可能成为无限的真理的。

由于主张有限先于无限或在企图有限的基础之上妄求无限,胡塞尔和萨特与康德就处于同一个人类学构型之中。作为先验主体哲学,现象学的做法在福柯看来是存在问题的。无论是意向性理论、意义理论,还是先验还原,现象学都不恰当地向有限的意向主体提供了“绝对的优先权”,向有限的意向活动提供了构建一切的作用,以至最终陷入了先验意识之中。福柯与存在主义也注定要发生冲突。萨特的“自为的存在”赋予“自在的存在”意义,人为世界万物的意义都是由人、意识、反思前的我思赋予的。对萨特而言,人(或意识)既是意义的读解者,又是意义的操作者和实践者。

人类学或意识哲学幻想在有限之上构建出无限,把有限当作无限来加以把握,把有限毫无限制地上升为无限了。在福柯看来,从16至18世纪,尤其在古典时代,由于西方文化受制于“神、事物间的相似、空间法则”,受制于“肉体、激情和想象”,由于占统治地位的大写的话语存在着,所以,人就不存在,也就谈不上人的有限与无限了,也就不可能有人类学的立足之地。人只是现时代的“特产”,因为现时代把人类存在建构为可能的知识对象,人本主义运动也是始于19世纪末的。

人类学主义贯穿于整个现代西方意识哲学之中，其中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中更是根深蒂固。现时代的人，作为生活着、劳动着和讲着话的存在，就是有限的，因为人受制于劳动、生命和语言，人的具体存在的规定性体现在它们之中。然而，现时代的意识哲学看不到这一点，硬是把人的有限性遮掩起来了，故意或无意地把有限的人当作谈论一切问题的基础；硬是把无限的、绝对的、创造者的角色归之于有限的人，让有限的人不堪重负、膨胀欲裂；硬是在抛弃了真正的无限之后，还乐观地梦想着进行一次从有限到无限的跃迁。

自从人在现时代存在起，有限性就是人具有的一切，只是被现代意识哲学人为地掩盖掉了。因而，福柯在《词与物》中所要作的，就是要表明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人是由那些部件和片断组成的，要恢复人在现时代具有的有限性及有限的身份、地位、作用，把人从无限拉回到有限。人的有限性，因涉及到人在生命、劳动和语言等方面的经验领域，因而本来是具体的。福柯阐明并要加以恢复和维护的正是人的这种具体的有限性。然而，从康德直至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近现代意识哲学，由于把名不副实的无限作用赋予给有限的人，所以，在损害人的有限性的本来面貌时，也损害了这个有限性的具体性。于奇智先生不恰当地认为从康德、黑格尔到胡塞尔的哲学都是为了使人“实”起来，“福柯在这个‘实’字上大做文章”（于奇智：同上引）。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词与物》的主旨表明，福柯之所以要批判近现代意识哲学，主要是因为它使本是“实”的人的有限性“虚”掉了，福柯要做文章的，应该是这个“虚”，而不是这个“实”。于先生似乎搞反了。而且，按照于

先生的理解，人本来是“虚”的，是福柯“用经验来充实”人的；由于“福柯为人恢复了劳动权、生存权与说话权”，所以，人就相当充实了。应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福柯所描述的人诞生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且不说人本来就是“实”的，因为人一经诞生就是生存着的、劳动着的和讲着话的存在，人一经存在就是“实”的。福柯让人“实”起来和更加“实”起来，这一提法就不是很恰当，因为人从不存在、存在到消亡这整个过程都是认识型转换所使然，是由考古学突变导致的知识排列发生变化的结果，人的科学的发展最终导致人的消失，这些岂是福柯所能为之的。

在反对笛卡尔以来，在放弃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上，尤其是反对自康德以来 200 多年的传统先验哲学上，福柯的“人之死”与尼采的“上帝之死”是血脉相连的，福柯认为“尼采质疑了笛卡尔和康德含义上的主体的至上性，或确切地说主体的特权，质疑了作为意识的主体的至上性或特权”（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 “Les problèmes de la culture, un débat Foucault - Preti”, 1972, p372）。由于福柯坚持认为认识功能的结构、规则是出现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同的主体是处于历史进程中的，所以，从笛卡尔、康德、胡塞尔、直至萨特和梅洛-庞蒂，尤其是从 17 直至 20 世纪的绝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就都武断地在先验层面上把主体与意识等同起来了。这样，在福柯眼里，西方哲学从笛卡尔开始就误入了歧途。

在西方哲学史上，“上帝之死这个观念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福柯指出，在黑格尔那里，“上帝之死”指的是“大写的

理性占据了上帝的位置，人类精神逐渐实现了自身”；在费尔巴哈那里，“上帝之死”指的是人清除了使人异化的上帝的虚幻，人意识到了其自由；但到尼采那里情形就有所不同了，尼采第一个奋起攻击把主体与意识等同起来的先验哲学，第一个与非常稳固的和持久的西方哲学传统进行彻底的决裂。

对尼采而言，“上帝之死”意味着形而上学的终结，人杀死了上帝，但人并未占据这个仍然空闲着的位置，超人则在同时超越着上帝的缺场和人的缺场(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 “Qu’ est - ce qu’ un philosophe?”, 1966, p553)。福柯同尼采一样拒绝在先验层面上把主体与思维的我等同起来。福柯并不把“人之死”看作“上帝之死”，而是看作“主体之死，大写的主体之死，作为知识、自由、语言和历史的源头和基础的主体之死”。“尼采表明上帝之死不是人之出现，而是人之消失，人与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因为人与上帝同时是孪生兄弟和互为父子关系：上帝死了，人不能不同时消失”(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 “Foucault, le philosophe, est en train de parler. Pensez”, 1973, p423—424)。上帝死了，人也将死去，因为超人的前景就预示着人逼近死亡了。福柯欣赏尼采在不预设认识主体存在的前提下，用一种话语类型对主体本身的构成作了历史分析，欣赏尼采否认认识与认识对象之间存在着由上帝确保的和谐统一，欣赏尼采因看到认识与本能之间存在着决裂、奴役和权力关系，而进而否认上帝的存在、统一的和至高无上的主体的存在，欣赏尼采把知识与权力结合起来考察。这样，在福柯眼里，尼采就第一个开始把西

方哲学从人类学沉睡中唤醒了,尼采为以后哲学的发展指明了道路,提出了继续努力的使命,于是,当代哲学在此基础上就可继续进行思考了。

虽然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同福柯一样主张作为第一主体的作者应在写作体系中消失,但德里达并没有接受福柯的与现代认识型相伴而生的“人之死”,而是提出了在“出场形而上学”内部的“人的界限”,认为主体的身份是“分延的”。

批判先验主体的奠基作用和构造作用,这在福柯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倡导历史连续性、进步甚至解放等总体历史观的历史主义就是事先假定了先验主体的这个作用,连续的、不中断的历史是与意识的统治权形影相随的。因而,福柯批判基于西方大写的理性之上的“真理目的论”和“理性因果链条说”,批判观念史所谓的“起源说”、“连续说”和“总体化”。在《词与物》中,福柯发掘历史的间断性的可能性,就是为了抑止主体的先验构造和奠基作用,表明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展开是无先验主体的,是匿名的,是无身份的。间断性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即“有时候,在几年之内,一种文化不再像它以前所想的那样思考了,而开始思考其他事物,并且以不同的方式思考”(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Éditions Gallimard, 1966, p64)。福柯发掘间断性、断裂、界线、裂口、个体性、力量关系等,主要都是为了杀死把人类意识看作一切生成和一切实践的原初主体这样的传统哲学家的大写的历史的神话。在这方面,福柯毫不犹豫地站在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哥德曼、卢卡奇、狄尔泰、19世纪的黑格尔主义者、霍克海默、萨特等人的对立面。